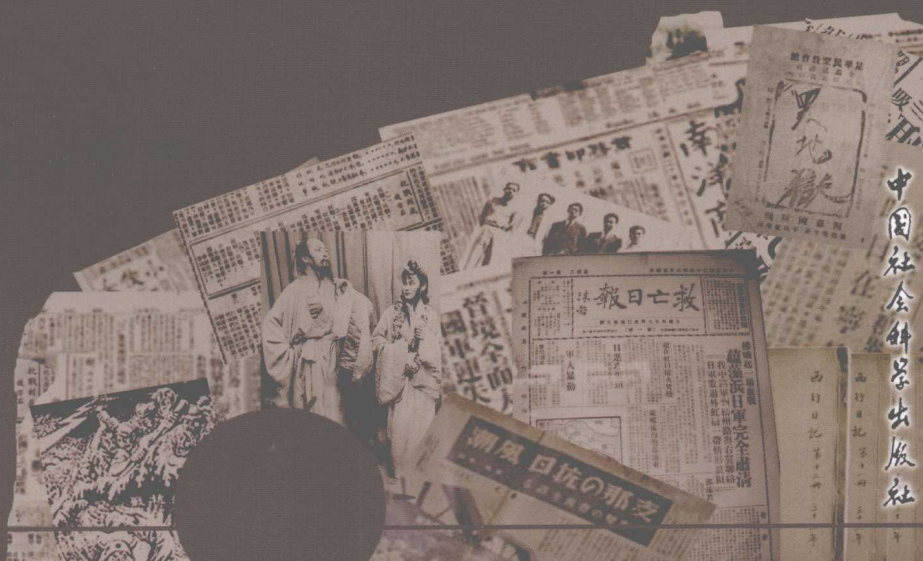


GUILINWENHUACHENG WENXUE YANJIU CONGSHU

桂林文化城文学研究丛书

桂林文化城 小说研究

雷敏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GUILINWENHUACHENG WENXUE YANJIU CONGSHU

桂林文化城文学研究丛书

桂林文化城 小说研究

GUILIN WENHUACHENG
XIAOSHUO YANJIU

雷锐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桂林文化城小说研究/雷锐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12

(桂林文化城文学研究丛书)

ISBN 7-5004-5880-0

I. 桂… II. 雷… III. 小说—文学研究—桂林市—现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8600 号

责任编辑 王冬梅
责任校对 朱晓青
封面设计 崔注中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审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5

插 页 2

字 数 260 千字

定 价 24.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雷锐，男，1947年生，广西南宁人。文学博士。现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代表作有：《壮族文学现代化的历程》（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小说现代化五十年》、《柏杨评传》、《桂林文化城小说研究》等近二十种（含合作），论文《再论抗战文学中“救亡”与“启蒙”的关系》等百余篇，多次获奖。

绪论

桂林文化城：抗战文化 沙漠中的绿洲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华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国共两党停止了十年内战，全国各民族、各党派、各团体，全体人民都聚集到团结抗战的大旗下，共同向日本帝国主义开战。历史的巨笔，在中国历史上以最绚烂的色彩，写下了悲壮磅礴的八年抗战史，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巍峨挺拔的抵御外侮、英勇奋斗的战斗丰碑，也为素来文化落后的南疆广西留下了桂林文化城这一光辉灿烂的文化史页。

1938年秋，由于敌我双方军事力量悬殊，上海、南京失守之后，武汉、广州又相继沦陷，几乎半壁河山沦于敌手。随着形势的变化，处于衡阳以南、韶关以西的广西省会桂林地位一下变得重要和突出起来。它作为与前线虽有一段距离但相隔已经不远的二线，不仅形成了一个战略后方的依托，而且还成了联结华东、华南特别是西南的重要交通枢纽。陆路四面交接，水路沟通东南，空中航线又已经建立，这种水陆空俱备的交通条件，使桂林具有进退自如、回旋余地较大的优越性。尤为重要的是，广西地方军政领导人素来与蒋介石中央存在着大大小

小的矛盾，抗战以来又进一步发展，桂系本身始终处于反控制的斗争之中。抗日形势高涨，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都表现出较开明的态度，放宽了对进步文化的控制，吸引了相当多的文化人前来广西。桂系领导人甚至在蒋介石 1939 年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也没有过分参与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迫害。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在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领导下，尽力扩大和充实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地，更为抗战文化活动在桂林的顺利展开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1941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桂林地位更加突出。大批文化人转向内地，途中大都经过桂林，比起国民党中央严重禁锢下的重庆，这里毕竟具有较宽松一些的自由，而桂林素称“山水甲天下”，遐迩闻名的风景，又无酷暑严寒的气候，对文化人的诱惑力非常直接而自然。由于种种原因，桂林成了当时文化人来去相对自由较为理想的中转站、休息地、暂居处。一时之间国内文人荟萃、文化单位云集、出版印刷事业也随之兴盛起来。几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书店、出版社竟达近 200 家，印刷厂多达 100 家，每月印刷用纸 15000 多令，每月排版达 4000 万字，各类杂志 200 余种，其中文艺期刊近一半，纯文学期刊近 40 种，综合性文艺期刊 50 多种。报纸也由原先只有《广西日报》1 种增至 20 多种。而文化团体多，文学社团林立，更是一时之盛，粗略统计，较著名的即有近 40 个。文协桂林分会、新中国剧社、国防艺术社最为活跃，甚至国际友人的组织也经常活动。于是从 1938 年底到 1944 年夏 6 年中，一个本来居文化边鄙的南疆广西，一个虽小有文名实为文化僻野的山城桂林，被抗战的号角声响震动，被抗战的炮火硝烟激发，居然成了中华抗战历史上一座耀眼的“文化城”，成为抗日大后方、根据地和沦陷区抗战文化的集结地和大总汇。“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桂林在抗战文化中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过重庆”^①,几乎“竟成为国民党统治下大后方的唯一抗日文化中心了”。^②

抗日战斗是全面的战争。除了军事斗争、经济、外交战线之外,文化战线也非常显著。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抗战初期的中国,几乎所有的战线都显出失败的状态,军事一溃千里,外交低眉顺目,经济左支右绌,独有文化,多少呈呐喊战斗激昂沸腾之势,喊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和胜利的希望。尽管初期的抗战文化多为理想化的呼号、空洞式的表现,毕竟表现出压倒性的力量。但是随着战争的深入,空洞的呼喊已经不能满足广大军民的需要,也让文化工作者感到创作后继无力。特别是东南半壁河山沦丧,战火燃及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何处可觅稍能喘息一下从事创作的地方?哪里能找到勉强可维持的印刷出版条件?和当时稍有些文化环境的地方相比,桂林倒是略显独到。比起重庆,桂林承受的政治压力要小得多。比起昆明,桂林的交通出版条件更为方便,且更接近前线。比起延安来,桂林文人来去出版印刷均更为便捷。难怪有些文化人干脆就将桂林当作大后方的“唯一”的抗战文化中心。当时整个中国从文化上来看,几乎可用沙漠视之,而桂林文化城,可算是沙漠中的一块不可多得的绿洲了。

水草虽然不甚丰美,毕竟吸引着沙漠中跋涉的旅人。大批文学家像候鸟似的飞到桂林,路过、小憩、暂居、长住。据不完全统计,短短6年里有1000多人,其中作家、艺术家占多数。诗人郭沫若、柳亚子、艾青……作家茅盾、巴金、艾芜……戏剧家

① 千家驹:《在桂林的八年》,《学术论坛》第1期第45页,1981年1月。

② 胡愈之:《忆长江同志》,《桂林文化城纪事》,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第133页。

欧阳予倩、熊佛西、田汉……这只是众多作家、诗人、戏剧家和散文家中的著名代表；外国作家也不少，日本的鹿地亘、英国的史沫特莱、美国的爱泼斯坦等，则是其中著名的代表。他们在桂林歇息、休养、发起和参与种种文学活动，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即使是离开桂林后仍将作品寄回桂林发表出版，还有许多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作家将他们的作品寄到桂林。粗略统计，抗战中在桂林发表作品的作家达 2000 人以上。正是他们，用粗糙的笔纸，蘸着漓江水磨成的墨，创作出桂林文化城文学的辉煌。作为时代、生活、人的感情反映的文学现象，桂林文化城文学受着大时代、大环境、大气候的直接影响，有着与桂林文化城几乎共同一致的特点。

首先，桂林文化城产生于 1938 年秋以后，这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开始，也就是说，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发展是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同步的。抗战初期，受全民抗战的全新形势鼓舞，受“九一八”东三省沦陷以来全民族被日本帝国主义奴役多年的愤慨的冲击，受迅速报仇雪耻情绪的刺激，受大国必强片面思维的影响；“速胜论”影响甚广。不能说这种观点的出发点和愿望不好，但它分析事物研究事物的思想方式缺乏足够的理智和辩证，带着很大程度的一厢情愿和急躁。将愿望代替现实，用主观代替客观，甚至在失败面前也不愿客观检查原因，一味用空喊掩盖败绩。终于，越来越多的溃败和惨输让人们看到“速胜论”的严重片面。继北平、上海、南京等全国最大城市失守之后，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广州、武汉又相继沦陷，华南、华中都陷入日寇的铁蹄。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但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战线拉长，军力开始受到限制，而中国军民经受了沉重的打击，开始适应战争的重负，缩短了战线和作为一个五千年古国四亿人大国的潜在力量也开始慢慢释放出

来。于是，战争双方进入胶着相持阶段。正是因为广州、武汉的失守，桂林的地位才凸显出来。广西素来落后，尽管抗战前几年桂系军阀的“三自三寓”政策（自卫、自治、自给，寓兵于田、寓将于学、寓征于募）让广西开始出现生气，并获得某些新闻记者用于宣传的“模范省”称号，但毕竟底子薄，经济建设积累少，省会桂林不过是二三十万人的小城，其战略地位很难与全国各省的大中城市比肩。但穗、汉陷落，华中、华南都失去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城市，撑持大局的责任就历史地、较前显著地落到桂林头上。整整6年里，在敌我双方犬牙交错、你进我退的相持中，桂林见证了战争中最漫长最坚韧最顽强的抵抗与期待。它经历了对战争初期失败的反思，经历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摩擦的矛盾错综的局面，三次反共高潮使桂林受到一波一波不亚于战争的激荡，桂林因而见证了党派斗争、阶级斗争的残酷和中国人内讧窝里斗的劣根性。到1944年，眼看相持阶段即将转化，桂林又经历了日寇发动湘桂战役的大动荡，几十万人民包括几千文化人、各文化单位、出版部门，不得不仓皇撤出桂林。桂林文化城的历史也就实际宣告结束。其后，桂林被战火摧残得只剩下一片败瓦断垣，直至抗战接近胜利才重新收复。“文化”二字再难提起！总之，桂林文化城是抗战相持阶段的产物，它经历了相持阶段的全部历史，也体现着相持阶段政治、文化的几乎所有特点。作为桂林文化城的文学，反映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变化、生活、斗争，很自然地就带上相持阶段的特点：错综复杂，曲折起伏，丰富深入。其实，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整个抗战历史，初期和后期的变化都相对单纯，因为敌人比较明确，力量比较集中，尤其是战略反攻阶段。而相持阶段不仅时间长、敌我之间的关系时明时暗、曲折复杂。提供给文学创作的生活也就更丰富。桂林文化城文学产生于相持阶段，同步于相持阶段，结束于

相持阶段，因其时间之长是其不幸，而因其获得生活之丰富又是其大幸。

相持阶段的特点，使桂林文化城文学典型地反映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变化。或者说，由于广西的特殊政治形势，桂林比起大多数中国其他地方更易于体现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因为桂系领导人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与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又隶属又独立、又听令又违抗、又服从又疏离的矛盾复杂关系，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较之国民党中央易于实现。为着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民族尊严，尤其李、白作为军人的气节，使他们容易接受与共产党合作的建议。但为着自己的利益和地盘，服从长官意志的军人愚忠，以及对共产党政策的不理解，他们也会不时与共产党摩擦、抗衡，甚而不惜反目。于是桂林文化城中又团结又斗争的政治特点十分鲜明。但总的来说，团结仍是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这种情况符合整个中国抗战历史的状况，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桂林文化城离国民党中央统治中心重庆有一段距离，地域上的距离加上原先一直存在的政治上的距离，使得团结的局面得以维持。因此当国民党中央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广西桂系就没有参与。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军统中统相继插入广西，桂系立场也随之右倾，但比起许多地方仍有区别，毛泽东曾指出：“上次居于中间立场的桂系，这次虽然转到反共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① 桂林文化城的许多文学活动，都是在抗日团结的旗帜下进行的。不少立场“左”倾、思想进步的文化人纪念活动，如鲁迅忌辰、柳亚子与郭沫若寿诞等，都得到文化界一致的参加。连国民党中宣部长潘公展也指出：鲁迅一生的工作“恰恰是在尽力唤起我们的民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741页。

族意识,坚强我们的抗敌情绪”^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桂林分会的成立,以及它领导下的桂林文化城的文艺团体、活动,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桂林的成功体现。文协桂林分会委员会成员有左、中、右倾向,对同一事件也有不同看法,但爱国抗日的大方向是共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简称“八办”)的建立,同样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在桂林的体现。正是利用了桂系与蒋系的矛盾,八办在桂林坚持了很长的时间,成为西南后方坚强的抗日战斗堡垒。虽然皖南事变后,八办被迫撤离,但它留下的影响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这些斗争和生活,都是桂林所特有的现象,比起当时后方的重庆、昆明、西安、兰州、迪化、延安,都显得要典型。反映到桂林文化城文学活动中,必然呈现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种种特点、变化、成功和挫折。1944年2—5月湘桂大撤退前,在桂林举办了西南五省戏剧展览会,聚集了南方数省近千名戏剧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参加,演出单位近50个,剧目近130个,造成中国戏剧史乃至世界戏剧史上空前的盛举。西南剧展的参加者虽然政治派别有差别,演出剧目内容也有不同,但参加者有着一个共同的立场:爱国抗日。这就保证了剧展成功的基础,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西南剧展使戏剧在民众中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让戏剧作品创作在民众的审美参与中获得提高和增加,使传统剧种剧目在时代的风雨中得到改良和新生。西南剧展的成绩,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实践在桂林文化城文学及活动中的成功反映,是大后方别的城市在当时所不可比拟的。正因为这

① 潘公展:《纪念鲁迅先生的意义》,转引自刘泰隆《桂林文化城——鲁迅研究的历史高峰》,《桂林历史文化研究论文集》第3集,广西区内部资料2004年版,第460页。

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和实践的典型反映，造就了桂林文化城文艺创作、文艺活动的繁荣。

武汉沦陷后，鄂西、湖南、桂东南成了军事斗争的前线。地处桂北的桂林，本来也不能不承受着桂东南日寇军事的压力。但敌军占领广州以后，注意力转向东南亚。这样，桂林便居于前线之后的二线位置。在炮火纷飞的前沿后面有一定回旋的空间，不像昆明、迪化、兰州等远置大后方之腹，又不似重庆那样护蔽在丛山急水的四川之内。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桂林是文化人从全国各地撤往后方的主要通道；香港沦陷后桂林更是文化人从南洋归回内地的唯一枢纽。回顾历史，桂林从秦朝建郡以来，虽说历史不短，但一直蛰伏五岭之南，难以从南疆经济文化落后的窠臼中跳出。崇山峻岭，遮蔽了桂林的视线，也抑束了桂林的胸襟。唐宋以来，桂林虽然是一省书院设置之所，明清以后，教育更是略成规模，清代还出现了著名状元陈宏谋，但桂林文化发展一直比较局促，经济更是忝居全国末位。新桂系的崛起，有力地推动了广西的政治经济朝现代发展，但文化上依然起色不大。到 20 世纪 30 年代，才在桂林出现一所国立高等学校——国立桂林师范专科学校。桂林的文化教育与上海、北平、南京、武汉相比，相距何止千里，即便与邻省湖南长沙、广东广州相比，也是远难并论！是抗战的烽火，给桂林带来文化上的新鲜血液。由于战争的驱迫，数以千计的文化人从全国各地来到桂林，有相当一部分著名文化人还长居桂林，桂林文化城不仅张开胸怀迎接国内的同胞导师，也张开胸怀迎接来自国际的新朋好友。桂系领导愿意和共产党合作，一致抗日，还大力罗致外省人才治理广西、经营桂林，欢迎外国友好人士来桂指导，以桂林为窗口了解、援助中国的抗战。中国共产党和广西人民将抗日作为契机，推动广西和全国更密切地结合，推动广西与世界接轨，从而使桂林文化城具备

了广西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开放性。这种开放性又是桂林文化城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战争迫使人们加大了居住的流动性，也迫使工商业增加了流动性。不仅体现在个人，也从国家的战略部署上体现出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已制订沿海特别是东南一带工厂企业迁移西南的计划。七七事变后，这些计划加快了执行的步伐。当时西南后方较大一些的城市中，除桂林公路、铁路、水路、空中都通畅外，连陪都重庆都未与外省接通铁路，依靠长江的水路逆流而上倍增困难。其他城市如昆明远在云南，公路曲折多险，铁路水路皆无。迪化、兰州远在西北，气候恶劣，交通不便。文化产业所必需的印刷设备相对轻便，因此，相当多的工厂企业内迁的首选地址倒是桂林这一起先不甚繁荣的小城。于是，一批批文艺期刊、报纸、书店、出版社、印刷厂，便陆陆续续从华东、华中、华南迁至桂林。它们作为文化事业的必备条件，与流动性更强自由度更大的文化人一起，从外部为桂林的开放制造了可能和扩大的条件。风云变幻的战争环境，为当时的中国内地提供了开放的需要，桂林不过是适逢其时，首当其冲，使开放性这个特点更加突出而已。

这种开放性不仅体现在国内人员物资的流动上，也体现在国际交往的扩大增加上。桂林特殊的政治、文化、地理环境，很快就吸引了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注意，也成为不少外国友人采访、路过、暂居的地方。一批批反法西斯组织和国际抗日人士，都在桂林设立联络处，著名的有：“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广西支会”、“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等，汇集了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朝鲜、越南、香港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反法西斯国际友人和知名人士。有些抗日斗士不止一次

到过桂林，并在桂林工作相当长时间，如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朝鲜抗日志士李斗山等。他们和中国人民，特别和广西人民互相交流支援，共同战斗，有力地加强了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力量，尤其是抗日的力量。共同的斗争，也使他们之间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应该说，桂林文化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是一个由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士组成的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条战线的形成，得益于桂林的开放性，同时，这条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又进一步推动着桂林的开放性。开放的桂林，必然使桂林文化带上开放的特点，桂林文化城的文学也显出吸纳众长、包含多种风格的广博的胸襟。

开放的特点，更加鲜明地将桂林融会到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阵线之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仅要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还要征服世界建立世界霸权。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从一开始便具有世界性，后来它不顾本身先天的弱点不断扩大战线，远未征服中国又分兵夺取东南亚，继而再挑起太平洋战争，都说明了这一点。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一开始也便具有国际性。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牵制了日军69%的力量，使其始终不能北攻苏联、与法西斯德国联手横扫欧洲战场以定世界大局。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英勇地深入东南亚半岛，远征缅甸，救援了英法军队。总之，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世界性，客观上促成了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国际性。中国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东方战场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中国抗日战争同步发展而又紧密配合的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发展和战斗，已经紧密无间地联系在一起。桂林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阵线亚洲战场西南战时的重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重镇，连接起正面战场与战略后方的通道，连接起中国抗战文化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精神

纽带。当时的桂林成为中国战场一个重要的新闻基地。国际新闻社桂林总社、英美使馆新闻处桂林分处等的设立，标志着桂林与世界主要血脉搏动的连接。中国青年记者协会桂林分会、华侨战地读者服务团等的成立，标志着桂林与全国抗战新闻的共同呼吸。据资料统计在这里出版的报纸就有近 20 种之多，《扫荡报》为中国陆军主办，《救亡日报》为文化人主办，在全国有着重大特殊影响。其余《新华日报》、《大公报》桂林版、《广西日报》等，都是在桂林建筑起自己对敌斗争的前沿阵地的。各大小报纸和通讯社，以宣传抗日救亡为首要任务，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息息相关，积极报道有关消息，特别是中央社所发的有关国际上反法西斯战争、国内抗日战争各个战场上的电讯，各报社都注意采用，而且都放在比较显著的位置。这些新闻报道，互相交流，迅速传布，极大鼓舞了同在反法西斯斗争前线后方的中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各国人民。从桂林文化城中发出的战斗消息和胜利捷报，很快就传到世界各地，像台儿庄大捷及其一周周年纪念的消息，高度赞扬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牺牲精神，有力地振奋了世界人民特别是欧洲人民与纳粹主义的斗争。美国报刊曾评论道：“这是日本建立现代化军队以来遭受的第一场引人注目的大惨败。”^①通过新闻电讯，桂林人民和中国人民一道，焦虑地关切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式爆发，焦灼地关注着莫斯科保卫战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每日每夜，担忧着欧洲战争的犬牙交错，欢呼着第二战场的开辟，一直到红军攻克柏林，原子弹在日本上空爆炸……桂林人民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为苏联人民捐献，为美英军队呐喊，为红军士兵欢呼……桂林切切实实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

^① [美] 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259 页。

线中的一个坚强哨位，一条顽强战壕，一个生死与共的部分。

桂林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中的地位作用以文化最为突出。正是基于反侵略战争这一共同特点。桂林文化城使自己的文化具备了基本的客观的反法西斯的正义特征。表现出特有的组织机构、文艺队伍、活动阵地、影响方向、接纳程度，开始并发展着充实着与国际文化的交往、学习与相融。实际上，从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开始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社会、团体与文化人士，就开始了对中国人民的声援、支持和直接援助。30年代苏联的不少文学作品，就不断发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谴责。史沫特莱、斯诺等美英记者，用自己的笔向世界读者报道了一篇又一篇中国人民正义的战斗。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更加多的外国记者、作家来到中国，深入前线，来到桂林，宣传鼓动，采访报道，撰文创作，把中国军民的爱国精神和英勇行动向世界传布。也就是说，世界反法西斯文化早在30年代初就已经向中国的抗战文化汇流，七七事变以后更是形成越来越强劲的潮流。桂林文化城正是这种双向汇流中最激涌的水域之一。其表现之一，是大量的翻译作品通过各种刊物报纸，出现在桂林文化城中，不仅有《文学译报》、《翻译杂志》这样的中国文化人创办的刊物，也有《东方战友》、《朝鲜义勇队通讯》等外国友人创办的刊物。这些刊物和许多对外机构，正是桂林文化城对外文化交往的主要阵地。桂林文化城以这些机构、刊物为媒体，将桂林、大后方乃至整个中国的抗战形势、精神风貌、文化状态传向世界，同时也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心声、战绩与文学艺术输入中国。仅《翻译杂志》一刊，就覆盖了世界各地的要闻，储存了大量时事政治信息与文艺信息。它的“时事论坛”栏目，将时事与文化结合起来；“西书介绍”栏目，译介了欧美各国出版的主要著作；“战时文艺”栏目，更是直接译介了战时各国的文

学活动，报道了反法西斯文学的最新活动概况。《文学译报》同样以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和专著为宗旨，特别侧重现代写实作品的介绍。这两个刊物均以介绍反法西斯斗争生活的作品为重，像苏联的西蒙诺夫、巴夫连科，波兰的瓦雷柳斯卡，法国的卡泰耶夫等，生动地再现了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壮烈场面，成为整个大后方、整个中国了解世界文学艺术的重要渠道。与此同时，在桂作家还努力将桂林的抗战文学翻译出去，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文学相互交流，交相辉映，走向世界，声援在同一战线战斗的战友。像司马文森的《雨季》、《人的希望》被译入英国作家约瑟夫卡尔玛的《中国短篇小说选集》。苏联作家也编选了俄文版的《中国短篇小说集》。艾芜的《山野》则被匈牙利文翻译出版。莫斯科出版的《国际文学》专门介绍了桂林文化城的《野草》杂志，使之在苏联文艺界得以流传，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化遗产收藏于苏联博物馆。桂林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阵线中的一环，正是以自己特殊的文化功能，发挥了在斗争中的作用。

也许是一种历史的巧合，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及其存在的时期（1938.10—1944.6），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式爆发和结束（1939.9—1945.5），时限上非常接近。可以说，桂林文化城的历史进程，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同步。因此如前所述，桂林文化城经历了抗战相持阶段的艰难困苦、曲折起伏，又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波谲云诡、风云变幻。因而桂林文化城有着一种沉重的历史沧桑感和一种伟大的历史创造力，使自己对置身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阵线中的位置有比较清晰的体会。近代以来，中国人饱尝帝国主义列强压迫，帝国主义侵略者成为清政府统治者的太上皇，洋人也成为中国人眼中的“上等人”、“洋大人”，轻易不敢仰视。虽然义和团运动曾对洋人大开杀戒，但这一极端的复仇